

中国“三农”报告

农民记者笔记1

◎ 徐少林 / 著

黄河出版社

ZHONGGUO SANNONG BAOGAO

2013，前十年的记录，后十年的轨迹！
看“农民记者”怎么看……

吴敬琏赞誉的“中国农民的代言人”温铁军作序

中国“三农”报告

农民记者笔记1

◎徐少林/著

黄河出版社

2013，前十年的记录，后十年的轨迹！
看“农民记者”怎么看……

吴敬琏赞誉的“中国农民的代言人”温铁军作序



责任编辑◎孙华锋

统筹监制◎鄢福路

策划编辑◎朱新开

版式设计◎阿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三农”报告：农民记者笔记.1 /徐少林著
--济南：黄河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460-0616-1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8173号

书名 中国“三农”报告——农民记者笔记1

著者 徐少林

出版 黄河出版社

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社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21号 250002

发行部 (0531) 82058166 82904707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10×1000(毫米) 1/16

19印张 260千字

版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0-0616-1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36.00元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人的话，农村就是这个人
的血脉。

序

老三农VS新三农

温铁军

谁会在意冬至时节的一场小雪？一面是附庸风雅的书斋客们赞叹着高楼大厦的银装素裹，另一面是巨商大贾饕餮这个超级现代化大都市该有多少车辆相撞带来的市场扩张。而据报道，今天的气温降到了46年以来的最低，还会使北京的年降水量历史性地超过700毫米！是啊，现代化消费和大城市热岛促进着气候暖化！人们很少知道，中国400毫米等降水线北移了一个纬度还多，粮食带随之向北扩张了上百公里，不仅带来了粮食近10年的产量增加；也在农业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出现了农业领域的生产过剩，诸如谷贱伤农、菜贱伤农和比以往更为严重的农民自发弃耕撂荒。

由此，我特意借给此书作序之机，再次强调我在近年来的讨论中提出的，包括“农民组织权益、农村社会可持续和农业生态安全”在内的新时期的新三农问题。这与工业化时代粗放型数量增长所要求的老三农问题——“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农业增产”，已经有很大不同了。自2006年彻底取消农业税和全面推行新农村建设以来，乡土中国已经进入后税费时代。时过境迁，人们都需要与时俱进。

徐少林写的《中国“三农”报告》，内容大致是我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强调的“三农”问题和乡村治理问题。这部书中写到一些与我有关的内容，委实是记不得了；其中涉及到几个早年跟我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创办《中国改革·农村版》共事的人，也久未联系了。而且，他找我约稿的时候，正赶上年底诸事繁忙，这意味着我不仅没有时间去核实书中所述的细节，还得在早应该偿还的诸多“文债”中给他加塞，才能列上这个新债！但，之所以仍然抽空略读该书并且提笔作序，乃是因为我说过：大凡有利于三农的事情，我都会尽力支持。

我自上世纪80年代从事农村政策调查研究工作以来就认为，我们这种发展中的亚洲原住民国家根本就不可能简单照搬西方的制度体系，也不能把殖民地国家关于“农业问题”的政策体系当做我们追求的模板。诚然，我尊重任何人在理念上认同西方人提出的普世价值，但也得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家，中国人无论理念如何都不再有条件像西方人在千年黑暗和百年战争乃至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之际不得不杀出一条血路去亚非拉搞殖民化，同时大规模地把他人掳掠为奴隶还为烧杀抢掠制造出各种所谓理性解释。

后来，由于在40多个国家做了比较研究，我甚至极而言之地下过结论：“我在发达国家没有见到农业现代化的成功典范，在发展中国家也没有见到城市化成功的典范。”据此强调，中国这种长期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在政策研究领域必须立足本土实际情况讨论“三农”问题。2004年到大学教书以后，也一直坚持着做田野调查和国际比较研究。虽然这20多年积累了一些经验层次的东西，也尝试着向理性高度升华，但很难说有什么深刻的理论。于是，在跟学生讲“三农”的时候，就会老老实实地承认：即使我搞了一辈子“三农”研究，现在活到一把子年纪了，也没有搞得懂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县！

据此看我提出的“经济基础的“三农”问题与上层建筑的“三治”问题

（我对县乡村三级治理问题的简称）”，也主要是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命题，意在促使学术界放弃浅薄浮躁和邯郸学步，加入到实事求是的真问题讨论中来。

比如，有关农村财务问题。这么多年人为地坚持“去组织化”改革造成的财务混乱客观上很难清理，根本就不可能靠农村基层自觉贯彻“财务公开制度”。也许剩下的办法只能是认真地借鉴“四清”经验自上而下派工作组了！在累积矛盾过分沉重的压力下，即使换了在北京办公室里自以为是的任何一个官僚下去做“村党支部书记”，也难以全面清理前人的账目。

这个说法，本来是在总结李昌平失败之后提出的，我曾经为此借用鲁迅小说的题目写过“李昌平出走以后”。他当年上书朱镕基总理得到中央七常委批示之后，主动请缨处置乡村财务中的大量负债，却几乎把很多上级部门都得罪惨了；处境尴尬的县委领导人不得不调这个颇有政绩的青年人离开工作岗位。诚然，如果是个文学作品，那很可能会抽象表达哪个当事人的单独突破，但现实中其结果无外乎是这个人独立承担了庞大的制度成本。

再比如，有关农村土地的问题。自从1949年全面推进土地改革以后，除了1956 – 1982年的高度集体化之外，中国农民在大部分时期里都是世界最大的小有产者群体，亦即“小资”。这些年各地的实践证明，如果政府去把农民变成拥有几套商品化住房的小房产所有者，则农民一般会愿意交出宅基地和承包地，因为这是让他从小土地出租变成小房产出租，其小资成分没有改变，有些城市近郊区农民甚至乐得拆迁，因为那是他们一步到位地变成城市中产阶级的机遇。而如果各地政府仅支付文件规定的现金去买断农民身份，以为让农民进城变成工人阶级就是社会进步，那么这样的政策思想确实很荒唐！因为这意味着迫使“小资变无产”。将心比心，谁都不愿意接受这种阶级属性下降！由此往往会造成大量遗留社会问题，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至于引发海内外热议的村民直选乱象频仍，我们历来认为那不是直选本身的问题。在乡村财产关系没有清理、社会治理结构也趋于劣化的条件下，简单地强调直选往往是乡村矛盾和冲突爆发的导火索。各地调查也反映出，农村基层大部分都不可能单纯通过这种办法作为构建乡村良性治理的框架，何况政府几乎不为直选支付费用，巨大的制度成本只能向乡土社会转嫁。至于各地上访反映出来的村民直选中影响公平、公正、公开等官方原则的恶劣做法，则也只能归结为是乡村治理困境所派生的问题。

读者如果是在对以上观点有所理解的情况下浏览这部书，则可以如同看万花筒似的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最近十年中国农村“三农”与“三治”的现实困境。但，为了对此后十年发展作研究借鉴，读者们还应该与时俱进地去多了解些近年来已经形成讨论的、包括“农民组织权益、农村社会可持续和农业生态安全”的新时期的新三农问题。

2012年12月21日于北京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农林经济管理组成员，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编者荐言

看懂农村，才能看懂中国！

对于这句话，只要是地球上的人类应该都不会予以否认乃至质疑。

然而，事实是，可供人们看农村的媒介少之又少，虽然报刊、电视、网络、图书等形成了信息爆炸时代，但涉及农村的内容却少之又少。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不在少数，研究农村的专家学者也不能说是凤毛麟角，干农村基层工作的公务员则可称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但真正引发广泛关注的有关农村的新闻、调研、理论性作品却少之又少。

不能说没有，至少曾有被叫好的《中国在梁庄》和《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两部书的作者均具有学者身份，前者是“文学博士”梁鸿，后者是“主修历史学、法学与传播学”的熊培云。他们殊途同归，采用的手法均是通过观察和记录自己生活过的一个村庄，将有关思考和结论放射至中国。其观察不可谓不细腻，记录不可谓不真实，思考不可谓不深邃，结论不可谓不具有浓烈的历史使命感。

那么，为什么还要策划出版这本《中国“三农”报告》？除了因为此类农村题材的作品少之又少而再多也不算多之外，主要是源于作者徐少林的身份和经历。

徐少林，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业记者。对农民兄弟的认同感，对记者职业的使命感，以及来自“山东汉子”的遗传，让他屡屡将个人前途乃至人身安全置之度外，也屡屡被所从业的报社予以表彰，其新闻报道曾多次被国家及省级领导进行批示，并获得高等级新闻奖项。

作为一名敢说、敢问、敢写、敢干的“老”农业记者，徐少林的作品内容

可以说体现的不仅是观察和记录，而是交锋，而且是最基层的原生态的交锋——

“最基层”，是指可以直达村庄的村民；

“原生态”，是指记述手法的忠实简朴，有时比纪录片更原生态，更像是24小时竖立在村庄上方的摄影探头，然后截取其中关键的片段；

“交锋”，是指在历史发展大潮之下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这种碰撞又形象地体现在不同层面的具体行为之上。

为什么徐少林能够做到这一点？

除了上文提到的“对农民兄弟的认同感，对记者职业的使命感”之外，还因为与那些抽时间做田野调查的专家学者不同，他是常驻“田野”，而且是所从业报社的“特种兵”，在面对最复杂最棘手的新闻线索时，负有侦察和攻坚任务。这就要求他必须深入一线，而且是最具焦点性和挑战性的一线。也就是说，不要说专家学者，就算是一般记者乃至农村基层干部，也很难积累下如此广泛且深达农村全层次、全角度、全方位的鲜活事例。

说到鲜活的事例，《中国农村调查》可以说涉及了中国农村方方面面的结点，包括与“三农”有关的财务管理、土地管理、村民自治、农资农产品、务工经商、精神文明、乡村生态文明等。在这方面，徐少林具有优势，而且是具有绝对的优势。

事实上，这部书是徐少林对自己近十年作为“农民记者”的回视，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经过沉淀、回访、反思的过程，便形成了目前的书稿内容。”因此，这部书堪称是对中国农村发展历程片段的理性记录。

这部书中的事例具有明确的结论，因为均经过党报的正式刊登。不过，对事例的深层次反思并没有明确结论。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结论，因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因为旧观念具有顽固性和变异性，因为这部书并不是一本单纯的“回忆录”，而是具有延展性或前瞻性的“调研报告”，其记录的事例所反射出的深层次问题，则势必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下去。

解决好农村问题，才能解决好中国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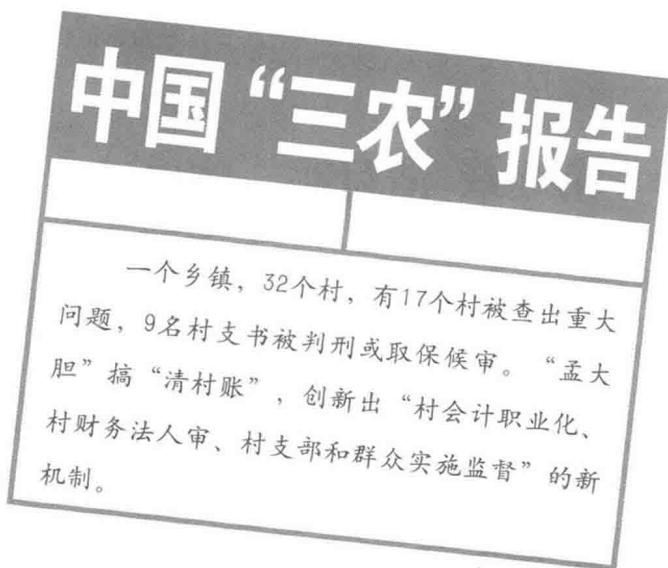
对于这句话，只要是地球上的人类应该都不会予以否认乃至质疑。

因此，希望这部书能够对所有关心、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读者朋友有哪怕一点点的启示。如果非要加一个期限的话，希望是十年！

中国“三农”报告

目录

老三农VS新三农	1
编者荐言	5
第一章 清村账，顺民心	2
第二章 着力解决土地纠纷	20
第三章 村民直选要公正	42
第四章 青石村的村民自治	57
第五章 不要让民选村官走麦城	67
第六章 “小问题”缘何成为大官司	87
第七章 丁马村的“三不像”	102
第八章 科技推广应以企业为主	123
第九章 石老人村静悄悄的改制	153
第十章 着力解决卖棉难	180
第十一章 假种子案追踪	196
第十二章 农资产品如何打造品牌	210
第十三章 违法办案得到纠正	226
第十四章 “农民律师”何时能转正	252
第十五章 农村陋习折射出大问题	263
第十六章 胶州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276
后记	290



第一章 清村账，顺民心

1.

我是大众日报社农村版的记者，本人也是纯农村人出身，虽然工作在省会城市济南，不过，因为工作的性质以及根在农村，所以一直与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有密切接触，有些新闻线索就是平常唠嗑唠出来的。

“农村工作有三大难，那就是——财务账、土地事、选村官。其中，最关键的是财务账。”我的三弟徐秋林时任乡党委书记，是从农村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几乎所有涉及基层工作的“脏活累活”都干过，因此只要一见面，就愿意向我诉诉苦，“上级部门布置工作就跟吃炒豆似的干脆利落，可到了下边，到了乡村干部这里就不是下文件那么简单了，许多具体情况需要考虑、需要解决，解决不好的话，就会受夹板气。你听说过这样的比喻吧？‘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所有的线都往基层这一根针的针鼻里纫，不管纫不纫得上，都得纫’。其他的工作还好说，只是‘财务账、土地事、选村官’这三大难，

就像火山口一样，基层干部坐在上面，不一定什么时候爆发，那就不是纫线的问题，而是要认命了。”

事实上，在2006年国内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前，这种“上级文件—基层工作—群众意愿”之间的矛盾体现得尤为突出，并以“三提五统”为直接矛盾点。这里所说的“三提五统”，是指村级三项提留和五项乡统筹。其中，“村提留”是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从农民生产收入中提取的用于村一级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日常管理开支费用的总称，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乡统筹费”是指乡（镇）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包括乡镇、村办企业、联户企业）和农户收取的，用于乡村两级办学（即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

如今，随着农业税的被取消，“三提五统”等已经成为历史词汇。不过，其涉及的相关本质问题却以其他的形式延续下来，比如徐秋林说的那个“三大难”，即财务账、土地事、选村官。为了把历史脉络理清，进而找到事物的本质根源，最终彻底解决长期困扰农村基层干部的种种问题，就让我们从取消农业税之前的本世纪初说起，那时也是我所在农村地区出现矛盾点最多或者说最激烈的时段。本章重点记述的是“财务账”，后文还有相关“土地事”“选村官”的章节。事实上，“土地事”“选村官”中出现的问题多与“财务账”有关。

数千年来，中国农民已经认为上缴“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事，因此，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农民对“三提五统”等是认同的，也是同意缴纳的。当然，想办法拖延或抵制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过真正出现激烈对抗的地方，往往是源于村“两委”班子懒、散、贪，以及村财务管理混乱等因素。一旦村民由此拖延或抵制，那么“缴纳”就会变成“收缴”，乃至强行收缴。

强行收缴的步骤一般是：由县乡派出工作组进村，帮助村“两委”做工作；抓典型，强行将其带到乡里办“学习班”；由乡主要领导带队，强行入户收缴，有时甚至会动用公安干警。如此一来，这类农村地区的干群关系必然受挫，乃至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为此，我认识的一名乡党委书记就曾被打了闷棍。

那次，这名乡党委书记带队进村收缴“三提五统”后，回到乡政府办公室。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出身于农村，是农民的儿女，这名乡党委书记也不例外，虽然干工作时雷厉风行，不过闲下来也会对自己的某些行为感到愧疚，因此独自喝了几口闷酒就在办公室睡下了。到半夜，从后窗跳进几个蒙面人，用被子把他捂起来，接着是一顿暴打，造成多处骨折，至今没有破案。

聊到这件事后，三弟徐秋林接着给我讲起那名被打乡党委书记的继任者孟永波。这个乡叫刘庄乡，历来问题多多，自从那名乡党委书记被打后，更是没人愿意来接任，孟永波却自告奋勇、主动请缨，仅仅这一举动便被人家起了绰号——孟大胆。在随后的工作中，他更是用行动把这个绰号坐实了。

孟大胆一上任，便直接去捅“蚂蜂窝”——清理村账。而且是刘庄乡32个村，一个村一个村地挨着清，重点村由他亲自坐阵，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步骤是：村里的账要和村民清；村民的账要和村里清；村里的账要和乡里清；乡里的账要和村里清。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居然请来司法部门的专业财务人员进村查账，只要查出问题便就地立案，最终有数十名村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理，其中采取法律措施的包括：3人被逮捕，6人被取保候审等。

三弟徐秋林本身就是乡党委书记，工作能力也没的说，平时被他佩服的人很少，可谈起孟大胆，连他自己都说那是个真爷们儿。转而，他又对我说：“大哥，你们真该报道一下孟大胆，若树起这个典型，我敢说，不仅基层干部服气，而且群众也肯定欢迎。我可提醒一下您啊，当着那里的老百姓可不要说

孟大胆的坏话，不然连十来岁的小孩子就敢跟您较真。”

我当面连连称是，不过，心里不以为然，我干了这么多年记者了，什么阵仗没见过，好话要说，坏话照样要说，只有实话实说地说，采访才能越接近真相，稿件才能越有长久的生命力。

2.

刘庄乡在鲁西平原，当我在乡政府大门下车时，一眼就看到一个宽额头、大脸盘、大鼻子、大嘴的汉子，加上那个大秃头，活脱脱的就是鲁智深在世啊。这不是孟会计的儿子吗？他怎么在这里？那还是在“文革”期间，他父亲当时是市委招待所的会计，曾和我一起被抽调到“学大寨工作团”团部，他有时会来看父亲，所以彼此算是老熟人了。难道他就是那个孟大胆——孟永波？

“大哥，原来是你！”那人快步迎上前，张开大手一把抓住我的双臂，亮开大嗓门说，“徐秋林只给我说要来一个记者，没说是你，这个徐秋林，差点儿让我怠慢了大哥。”随即，拥着我进了他的办公室，“这就是我的上任挨揍的办公室，我一来就搬进这里了，有人劝我到别的办公室，哈哈哈，我就不信这个邪！对了，大哥，咱们事先说好喽，你来这里吃饭喝酒我个人全包，采访这件事呢，对不住了，我从不接受记者采访。”

一听这话，我以“嘿嘿”两声应对，不肯定，也不否定。我知道，像孟大胆这样的性情中人，既然他说了那样的话，若非要采访往往会被碰一鼻子灰。所以，转而问他：“你父亲的身体还好吧？”

这样把话题一岔开，尴尬的气氛立刻就缓解了。他回答说：“我爸可

硬朗了，退休后非要回乡下老家，还种了一院子的菜，养了十几只鸡，好着呢。”

我又问：“你不是水利学院毕业的吗，我听说省水利厅想留你，多么好的工作啊，你咋不留下呢？”

他说：“当时，省水利厅到学校选人，我确实被选上了，可自己不想去，嘿嘿。不是我觉悟高，是因为我爸得了癌症，身边需要人照顾，我就选择分配到我家所在的镇，任镇办公室秘书，同时跟着分管水利的副镇长跑跑具体工作。”

我故意诧异道：“那你进步很快呀，才十来年就当上乡党委书记了。”

孟大胆也不谦虚了，得意地笑道：“还算可以吧，在我们那批毕业生里，我算是进步最快的。先是在一个镇当副镇长，又到另一个镇当镇长，前年才来这里当书记。这不最近又要换届了，我还不知道有什么着落呢。”

这样话一聊开，就好办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占据一个制高点进行深入采访。以我的经验，有三个方面可供选择：一是“拉虎皮做大旗”，即亮出权威部门或人物令被采访对象就范，比如我所在的大众日报是省级党报，在一般情况下市级领导是积极配合的，对于孟大胆而言，就不必劳驾市级领导了，因为我在调到大众日报之前曾任临清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摆个老谱就行了；二是“拉熟人做助阵”，这也好办，我三弟徐秋林和孟大胆同任乡党委书记；三是“追责激将法”

于是，我对孟大胆说：“那咱们就谈谈你继续进步的事。老弟，你先别紧张啊，我们接到一封涉及你的群众来信，报社领导就派我先来调查调查。我觉得，若有问题，那就要敢于承担；若没问题呢，该澄清还是要澄清。你说呢？”其实，记者外出采访都是要经过报社领导批准的，在这方面，我没说假话。